

大国崛起中的时间视野与跨期选择

——基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与美国的案例分析*

曹德军

内容提要:时间因素在大国崛起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战略时机、跨期选择与节奏变化均会塑造决策者的政策选择偏好。历史上的崛起大国都面临当下与未来的跨期选择问题。一方面,时间视野可以改变重复博弈中的收益预期,调整风险偏好;另一方面,时间视野受决策者个性与竞争压力影响,从而导致不同的战略决策。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德国与美国同时在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下崛起。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战略耐心不足,逐步偏离俾斯麦时期的审慎克制政策,其战略急躁最终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略冒进中溃败。同期崛起的美国恪守孤立主义与门罗主义,保持长期时间视野与战略克制。尽管美英存在诸多利益纷争,但基于国际仲裁与有限扩张原则,美国成功缓解了英国的敌意认知。德国与美国的崛起经验表明,即使在相类似的崛起环境下,外交决策者的战略耐心与风险预期差异,也会产生差异化的崛起策略与结果。将时间变量引入大国竞争分析,有助于揭示跨期选择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时间视野 跨期选择 风险预期 大国崛起

引言

大国崛起本身是一个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的过程,当下与未来、短期与长期利益的权衡都会影响崛起成败。在不确定的大国竞争环境下,外交决策者的时间视野会影响其对崛起风险的主观评估。将时间视野引入大国崛起进程分析,有助于考察崛起大国如何对近期与远期两个时间点上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然而长期以来,基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围绕战略时机、跨期选择与节奏变化的时间研究相对滞后。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治理变革背景下新兴大国国际公共产品差异化供给研究”(项目编号:25BGJ065)的阶段性成果。

“行为主义革命”影响下的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往往将大国竞争互动视为一种均衡过程,这种抽离或忽视时间要素的“静态”思维,越来越难以解释大国崛起进程的非线性与外交决策的不确定性特点。对此,部分国际关系学者批评与反思忽视时间性的战略研究,呼吁进行一场研究范式的“时间革命”。^①

正是大国战略竞争中的不确定性,促使领导人在不确定未来与相对确定的现在之间进行权衡。尤其对于崛起国而言,时间视野是理解危机决策的关键变量。具有短期视野的急躁的决策者为了尽快抢占优势或机会窗口,愿意“赌一把”而可能招致战略包围;拥有长期时间视野的耐心主义者为了追求长期目标,保持战略审慎以避免引发霸权国敌意。1914 年前后,德国领导人的短期时间视野导致他们相信战争不可避免,这种“宜早不宜迟”的信念加速了战争决策。^② 正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针对德国的战争动机质问道:“如果你面临现在必死无疑和两年后必死无疑的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当然,你会冒险一试,指望事情会有转机。”^③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前景,崛起国的决策者如何评估跨期选择中的风险预期,进而应对崛起压力?时间因素将如何塑造崛起国的竞争策略?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通过对比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德国与美国的崛起案例,展示时间视野与战略竞争之间的逻辑关联。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放弃俾斯麦时期的大陆平衡政策,其短期时间视野最终引发英国制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同期崛起的美国保持长期时间视野,秉持自由主义的国际仲裁与不干预原则,最终获得英国的迁就与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与美国崛起案例,是检验外交决策跨期选择的经典案例,清晰展示了战略耐心对竞争选择的塑造逻辑。

一 国际政治中的时间视野分析及其争论

全球政治权力关系与时间因素密切交织,大国崛起进程的剧烈变迁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的时间视野争论。鉴于大国竞争实践总是复杂动态的,政治决策者需要充分预

^① Andrew R. Hom, “Silent Order: The Temporal Turn in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Vol.46, No.3, 2018, pp.303–330; Ty Solomon, “Rhythm and Mob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3, No.4, 2019, pp.1001–1013; 胡键:《“战略时间差”与中国的战略安全》,载《国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57–78 页。

^② Jack Snyder, “Better Now Than Later: The Paradox of 1914 as Everyone’s Favored Year for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9, No.1, 2014, pp.71–94.

^③ Lord Riddell, *Lord Riddell’s War Diary 1914–1918*, Ivor Nicholson & Watson, 1933, p.336.

判风险差异,把握外交决策的时机选择。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外交决策者需要保持审慎并把握时机,因为“从长远上讲……其外交得当,可以充分发挥现有权力因素的作用,并且由于外交出色也会弥补其他领域的不足。”^①而崛起国要向霸权国展示可信承诺与善意信号,就需要通过战略克制管控国际社会对其崛起的不确定性认知。正如大卫·埃德斯坦(David M. Edelstein)所言,国家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未来的不确定与时间视野差异结合会产生令人意外的结果。^②整体上,围绕大国崛起与权力转移的时间变量,在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存在一些零散争论。

(一)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时间争论

近现代以来,欧洲哲学中的“时间之箭”隐喻认为,时间是单向或不可逆的,包含当下、过去和未来的一致与连贯的顺序。19世纪西欧秉持的线性时间观在全球扩散,最终成为“全球霸权”下的时间标准。^③在线性时间观影响下,主流政治学理论框架致力于追求普适、宏大的社会规律,用静态化与横向化分析将延绵的时间截断成一块一块思维隔间。对此,约书亚·迪恩斯塔格(Joshua Foa Dienstag)指出,要从不同的时间维度关注大国崛起互动的变动性和偶然性。^④换言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时间研究并不充分,但也暗含了不同的时间观争议。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者通常认为大国竞争在权力失衡—平衡循环中重复。新现实主义将国际关系视为“连续性和重复性”的有序连续体,历史会不断回到过去。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 Waltz)强调,国际体系结构的延续稳定特点,会使国家所陷入的安全困境不断强化重复。^⑤因此,曾经的衰落大国依然可以再次崛起,只要国际结构的排列原则发生变化,就有新的崛起机会。当然,大国竞争的时间维度不存在唯一的逻辑。自由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大国崛起并非必然产生秩序冲突。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进入单极时刻,围绕历史进步的方向,亨廷顿反思人类是否注定要进入一个无尽的文明冲突世界?^⑥而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已

①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

② David M. Edelstein, *Over the Horizon: Time, Uncertaint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6.

③ Karl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ated by Martin Nicolaus, Penguin Books, 1973, p.463.

④ Joshua Foa Dienstag, “Pessimistic Realism and Realistic Pessimism,” in Duncan Bell, ed.,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ariations on a Realist The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59-176.

⑤ Kenneth N.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More May Be Better: Introduction,” *The Adelphi Papers*, Vol.21, No.171, 1981, p.1.

⑥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1993, pp.22-49.

经终结。^① 冷战后的国际权力流散与观念变迁使得建构主义者认为,实践过程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国竞争的时间因素。从根本上而言,大国的权力平衡并非一种机械的物质制衡或静态的力量组合,而是由国家间的能动建构与持续的实践过程所塑造的非线性时间认知来决定。^②

概括而言,国际政治研究的时间变量在宏观层次、中观层次与微观层次上共同存在。在宏观长时段维度上,全球政治的秩序转型与叙事记忆受积累演进逻辑所约束。在中观中时段维度上,大国竞争的时间视野与节奏轨迹秉持间断均衡逻辑。在微观短时段维度上,外交决策的机会窗口与时机选择受制于事件序列逻辑。

第一,宏观层次的长时段分析强调全球政治的竞争演化周期。从大历史的演化视角来看,近现代大国兴衰历史充满了霸权交替的长周期。^③ 大国战争导致权力等级的格局发生变化,崛起国如能把握机会之窗,就有机会重新塑造国际秩序。长时段分析具有宏阔视野、整体史观、多维度比较的特征。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指出,16 世纪的葡萄牙、17 世纪的荷兰、18 世纪与 19 世纪的英国、20 世纪的美国大多维持了全球体系与秩序稳定,分别为世界留下秩序遗产。^④ 此外,大国兴衰的长时段存在不同的历史叙事,尤其是战争成败会在长时段留下不同记忆。杰弗里·奥里克(Jeffrey K. Olick)在《父辈们的罪孽:德国、记忆、方法》一书中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敌对分裂,使得东德与西德具有不同的历史记忆。^⑤

第二,中观层次的分析关注预防性战争的时间预期。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预防性战争与时间因素密切相关。^⑥ 预防性战争理论将时间因素直接纳入推演逻辑,其因果关系的焦点不是物质资源的权力转移,而是行动者的时间偏好变化。^⑦ 诺林·里普斯曼(Norrin M. Ripsman)等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德国宣战前的绥靖政策,是“花钱买时间”。^⑧ 从中时段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在 1914 年爆发,源于列

① See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16, No.4, 1989, pp.3-17;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The Free Press, 1992.

② David M. McCourt, "Practice Theory and Relationalism as the New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0, No.3, 2016, pp.475-485.

③ See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④ See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⑤ See Jeffrey K. Olick, *The Sins of the Fathers: Germany, Memory, Metho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⑥ Jonathan Renshon, *Why Leaders Choose War: The Psychology of Preventio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6, p.3.

⑦ Dustin Tingley, "Rising Power on the Mi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1, No.S1, 2017, pp.S165-S188.

⑧ Norrin M. Ripsman and Jack S. Levy, "Wishful Thinking or Buying Time? The Logic of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3, No.2, 2008, pp.148-181.

强对开战有利的形势误判,当大多数决策者持有“宜早不宜迟”的信念,就会忽视长期的战略风险,夸大短期的战略收益,从而陷入“崛起困境”。^①当权力转移接近临界点时,霸权国决策者就可能焦虑起来,其时间视野由之前的长远视角变得更加短视,因为威胁已经迫在眉睫,战争风险迅速增加。^②

第三,微观层次的短时段研究突出外交决策时机的选择。外交决策的时机选择强调基于时间的动态变化(结构与能动性互构),将国际谈判等置于时间流逝的动态背景下去理解和把控。短时段维度的时机选择取决于领导人自己对时机成熟度的主观判断。决策者秉持事件序列的逻辑,在短期收益/风险与长远收益/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决策。在冲突各方评估其行动方案时,“时机”就是冲突解决的关键。当博弈一方捕捉到化解危机的“机会窗口”时,它就掌握了谈判的主动优势。短时段的事件序列关注初始起点差异,而在这个序列开始之前,初始条件其实已经存在。^③在旷日持久的大国竞争过程中,捕捉化解国际危机的“时间窗口”构成历史性关键时刻。

(二)权力转移中的崛起国时间视野分析

大战略的本质在于权衡利弊。在国际危机中,决策者究竟是应该选择风险承担(急躁冒进)还是风险规避(克制等待)?这是一个典型的跨期选择难题。由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决策者往往会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以寻求更有收益的前景。^④国家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为了理解时间视野对领导人风险预期的约束机制,有必要打开外交决策的“黑箱”。在大国崛起背景下,具有较长时间视野的领导人会更关注崛起大国的实力对比变化。从根本上说,短期和长期权衡代表“现在或以后”的两难选择:是当下采取行动,还是将风险推迟?

其一,在权力转移阶段,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竞争受时间视野约束。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决策者需要进行“前瞻性决策”,立足当下对未来进行风险预估与准备。国家领导人能否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时间权衡,将过去或将来因素联系起来,将直接体现其战略决策水准的高低。如果一个领导者专注于短期利益,那么可能无法对中长期威胁做出充分有效的反应。相反,一个专注于长期利益的领导者可能会从全局长远考量迫在眉睫的威胁。就预防性战争理论而言,1914年无论从风险偏好角度还是从预期收益角度来

^① Jack Snyder, "Better Now Than Later: The Paradox of 1914 as Everyone's Favored Year for War," pp.71-94.

^② 相关论述参见曹德军:《全球政治的时间维度与大国竞争的动态演化》,载《世界政治研究》,2023年第4期,第55-80页;曹德军:《全球政治的时间维度:理论与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

^③ Jack A. Goldstone, "Initial Conditions, General Laws, Path Dependenc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4, No.3, 1998, p.834.

^④ 孙彦:《风险条件下的跨期选择》,载《心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1期,第28-34页。

看,都不是开战的最佳时机。但在 1914 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国决策者却同时希望尽快发动战争,彼此都在匆忙行动中迎头相撞,陷入一种“时机悖论”。^①

其二,时间视野影响领导人应对威胁的能力和方式。国际体系并非处于静态之中,新兴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战略节奏都在不断变化。越接近权力转移门槛,崛起国领导人感受的战略节奏就越紧迫。当大国崛起的时间点接近于权力转移的门槛阈值时,崛起国与霸权国都会感受到一种竞争节奏加速度;当时间点远离权力转移的门槛阈值时,双方又会感觉竞争节奏变慢。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接近于崛起门槛阈值的德国与日本,在保持了多年慢速崛起后,突然进行战略加速。非匀速的战略节奏可能是国际结构的压力所致,也可能是崛起国决策者在权衡当下与未来成本—收益时,选择了短期视野。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崛起国越接近权力转移门槛,霸权国就越有可能采取再平衡行动。^② 因此,崛起国接近权力转移门槛时,要警惕霸权国的“先发制人”,后者感受到优势流逝会失去战略耐心。

其三,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存在张力。对崛起国的威慑和先发制人打击不能过早,否则短期收益违背长期利益的可能性就越高。如果崛起国确实没有威胁霸权国地位的实力与意图,那么霸权国就没有必要采取行动,而是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何时发动预防战争取决于它对崛起国家意图与实力的看法。相比之下,崛起国则并不急于表明自己的意图,保持战略模糊有助于为崛起争取更多空间与时间,当实力对比跨过临界点后,崛起也就水到渠成。因此在权力转移的成功案例中,霸权国倾向于长远的等待与观察,崛起国也倾向于长时期等待与隐忍,这样双方都在客观上维持了国际秩序的和平稳定。简言之,在权力转移的关键阶段,崛起国的时间视野与跨期选择差异,将导致不同的选择。^③

二 跨期选择理论视角下的大国竞争互动

时间偏好并不是一个常量,即决策者的时间视野具有主观变动性。跨期选择受主观因素影响,大国权力竞争则受决策者风险预期与战略耐心的约束。^④ 所谓跨期选

① Jack Snyder, “Better Now Than Later: The Paradox of 1914 as Everyone’s Favored Year for War,” pp.71–94.

②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W. W. Norton, 2015, p.118.

③ Robert Powell, “Uncertainty, Shifting Power, and Appease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No.4, 1996, pp.749–764.

④ George F. Loewenstein and Drazen Prelec, “Anomalies in Intertemporal Choice: Evidence and An Interpret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7, No.2, 1992, pp.573–597.

择,是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点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尤其是在短期收益与长远收益之间进行权衡的决策进程。在跨期选择中,决策者的当前利益与未来回报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需要在T时刻与T+1时刻之间进行跨期选择权衡。时间视野体现的是对未来不确定风险的耐心承受程度。决策者感知的时间压力越大,认为当下的威胁迫在眉睫就倾向于“现在就获得回报”;若决策者感知威胁压力较小,不存在时间紧迫性就会“不在意一时得失”。

(一)跨期选择下的长期视野与短期视野

领导人的时间观将深刻影响其采取权宜之计还是长久之策。拥有长远时间视野的国家在面对短期的利益与冲突时,会显得更加从容和有耐心;但是缺乏长远眼光的领导人只关注眼前可以到达的时间段,很少考虑当前行为的未来效应。在解释风险或不确定性下的决策时,分析领导人的时间信念有助于理解权力转移中的非线性变化特点。

第一,时间视野影响着领导人对风险前景的评估。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国的实力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各国决策者可以根据威胁的严重性及其应对能力,评估如何以最佳方式重新应对这一威胁。根据时间视野差异,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领导人:时间视野短的领导人和时间视野长的领导人。后者更有可能克制对当下短期利益的追逐,以便从长远上获得最大的收益。^①当领导人时间视野较长时,更有可能恪守承诺,或有更大的激励去投资公共产品;短期时间视野则使领导人更有可能进行欺骗与急功近利,更有可能挥霍资源或采取冒险行动。

第二,时间视野差异塑造崛起国的选择策略差异。短期时间视野的决策者往往偏好战略冒进,即时机未到却强行为之。历史上的战略透支与抢先行动策略,大多是成本非常高昂的。这种策略之所以难以持续,是因为崛起国关注短期得失,或急于求成或锱铢必较,最终诱发霸权国或国际社会集中精力对其进行制衡。战略冒进的实施者大多具有一定的投机心态,基于对未来情势的悲观预期,认为“晚行动不如早行动”“集中力量毕其功于一役”。如果崛起大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为单极体系,没有其他同时崛起的大国或其与霸权国实力差距迅速缩小,则崛起大国更有可能较快引起霸权国的战略关注。在此情境下,崛起国可能会更担心自己招致先发制人的打击,从而尽快采取行动来保护当下收益并为未来冒险;而霸权国可能更倾向于采取强硬行动来阻止其继续崛起,于是战略冲突势所难免。

^① Mancur Olson,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No.3, 1993, pp.567-576.

第三,长期时间视野下的崛起国偏好战略拖延。拖延是为了延迟满足,避免提前遭遇风险,本质上也是风险规避策略。战略拖延策略是较为漫长却安全的崛起方式,一方面可以避免自己实力过于突出招致霸权国或其他国家联合制衡;另一方面,以拖待变的方式本身是和平的,回避采取激烈手段促成权力转移的风险,有助于崛起国在国际社会获得合法性。与之匹配的是缓慢匀速崛起轨迹,即崛起国以缓慢的、不容易察觉的速度崛起。这种崛起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并没有出现戏剧性的、变革性的时刻,例如美国在英国霸权体系下的崛起就相对自然。在此情况下,新兴崛起大国从多极体系中脱颖而出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霸权国并未将主要战略注意力放在崛起大国的威胁上,崛起大国也相对低调。

(二)跨期选择下的风险规避与风险接受

权力转移本身并非匀速发展的,可以加速也可以减速。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表明,跨期选择的主观认知与前景预期充满不确定性。崛起国决策者的时间偏好(长期视野和短时视野)以及前景预期(乐观与悲观)的程度差异决定了崛起策略的不同,甚至影响霸权国对其战略意图的判断,最终影响崛起成败。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领导人的时间视野开始快速缩窄,他们希望通过冒险抢先行动来抵消未来收益的不确定。威廉二世与希特勒都曾试图压缩崛起时间,但战略冒进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由此可见,崛起国领导人的时间视野将深刻塑造其风险预期与竞争策略选择。

一方面,长期主义者锚定未来的参照点,对当前损失的敏感程度较低。基于损失厌恶和禀赋效用假设,具备长期时间视野的行动者以未来作为参照点,将当下付出的代价看作获得未来收益的必要投资,对未来获益充满乐观预期。心理学研究认为,未来与当下因素在决策中所占的比重并非一直不变,这一现象被称为“逆向禀赋效应”。^①历史上,很多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担心长期投入在最后时刻化为乌有,规避损失的心态使得决策者改变风险预期。

另一方面,不同风险预期会导致不同的崛起成效。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英国、美国、德国、苏联、日本均先后崛起,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与二战中的日本均在急速扩张中走向战略溃败;而英国、美国与苏联则把握战略时机,基于战略耐心与合理决策实现权力转移。从风险决策角度看,一战前的德国决策者是典型的急躁主义者。以威廉二世为首的德国外交决策者过分相信英国不会介入1914年的欧洲战争,低估了

^① Jack S. Levy, "Loss Aversion, Framing, and Bargaining: The Im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7, No.2, 1996, p.182; 李心丹:《行为金融学——理论及中国的证据》,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8页。

当时大国关系的高度不确定性。而且在多极格局下,德国同时面临西线与东线的竞争压力,战略冒进下的战争成本也十分高昂。^①与威廉二世的急躁主义相反,俾斯麦的战略耐心立足长远眼光,认识到战略克制与耐心审慎是应对不确定性的必要素养。由此可见,决策者的不同时间视野导致崛起国的战略节奏变化,最终影响成败。

在权力转移进程中,时间在谁的一边?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进入相对衰落的时期,而美国和德国在全球舞台上迅速崛起。尽管这两个新兴大国均对英国霸权构成挑战,但最终招致的霸权回应与战略压力却截然不同。英国最终选择相信美国的战略善意,并认为美国可以成为维护全球秩序的合作伙伴。然而,德国的战略急躁却引发英国的强烈威胁感知,英国领导人最初选择了安抚和对冲,但当实践证明德国的急迫好战难以阻挡时,霸权国选择了遏制策略。^②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短期视野与战略冒进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意志帝国从崛起巅峰到迅速衰败的转折点。大战爆发之前,德国决策者的时间视野经历了显著变化。尤其是俾斯麦首相离职后,德国决策者很快就放弃长期克制战略,急切走向全球扩张之路。当时,德国决策者与政治精英们主张先发制人、速战速决。德国总参谋长“老毛奇”在备忘录中写道:“我们一旦实施了动员就不必承担侵略者的责任,任何等待都会毁掉我们的形势。”^③而在此之前,德国首相俾斯麦长期强调控制战略节奏,对国际竞争保持超乎寻常的清醒头脑与长远规划。^④例如,1865年威廉一世要求普鲁士将帅们乘胜追击,彻底打败奥地利;但俾斯麦却努力拖延与阻止对奥地利的肢解,避免引发法国干预与奥地利国内革命,因为这从长远上都不利于德国统一。俾斯麦的隐忍克制与长远战略眼光,使其大战略目标顺利甚至超预期实现。但是1888年6月威廉一世年轻的孙子威廉二世继位后不久,俾斯麦便遭解职。^⑤自此,德国外交政策被急躁主义与短期时间视野所主导,缺乏对国家

^① See Gerhard Ritter, *The Schlieffen Plan: Critique of A Myth*, Frederick A. Praeger, 1958.

^② Daniel M. Kliman, *Fateful Transitions: How Democracies Manage Rising Powers, from the Eve of World War I to China's Ascendanc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pp.3-5.

^③ 赫尔穆特·卡尔·冯·毛奇从1857年起担任普鲁士总参谋长30年,外界称其为“老毛奇”(Helmuth Karl von Moltke)。其侄子赫尔穆特·路德维希·冯·毛奇(Helmuth Ludwig von Moltke)1906年也担任总参谋部参谋长要职,一般称其为“毛奇”。

^④ 丁建弘、陆世澄主编:《德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⑤ 1888年3月,德皇威廉一世去世,6月,其年轻的孙子弗里德里希·威廉·阿尔伯特继位,即为德皇威廉二世。由于与德皇政见不合,主张战略克制与长期视野的俾斯麦被解职。

战略目标的冷静估计与长远耐心,最终引发致命挫败。^①

(一)后俾斯麦时代的外交战略转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正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致力于在殖民帝国竞争时代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在这一历史阶段,俾斯麦的“耐心主义”被威廉二世的急躁主义所取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20年时间里,俾斯麦苦心经营大陆平衡政策,认为德意志的利益在于阻止欧洲强权之间爆发战争。1877年,俾斯麦在其著名的《基辛根口述备忘录》中指出:“我眼前浮现的目标景象并非在任何地点开疆扩土,而是一个整体的政治局势,那局势使得除了法国之外的所有强权都需要我们,并可预防他们透过彼此间的关系,组成同盟来对抗我们。”同时,他也表示为了保存德国统一的成果需要选择克制战略,这包括:(1)放弃在欧洲进行任何形式的领土扩张;(2)在德国境内全面抑制扩张的野心,特别是审慎对待“大德意志帝国”的努力目标。^②然而,德皇威廉二世却与俾斯麦所持政见不同,他更强调在急速扩张中确立世界大国地位。

1888年,29岁的德皇威廉二世登基。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并不满足于将大国权力隐藏起来,而是渴望德国获得自己“在阳光下的应有地位”。为此,他解雇了被认为过于谨慎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并任用更支持扩张主义的列奥·卡普里维取而代之。^③在俾斯麦离职后,德皇威廉二世大幅增加了德国的国防开支,并全权掌握了德国外交“指挥权”。^④威廉二世登基后十分渴望亲政,但由于缺乏全局眼光与战略谋划,只关心如何在国际舞台上炫耀德国。^⑤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德皇具有绝对的外交决策权。历史学家对威廉二世的评价基本相同,认为其好大喜功、性格急躁、反复无常。1890年,威廉二世继位后不到两年,就决定放弃俾斯麦的同盟政策,推行“新路线”:获得海外殖民地,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挑战英国的海军霸权。1897年以后的德国对外政策与俾斯麦在19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的外交政策截然不同。威廉二世频繁诉诸危险的边缘政策,试图以威胁恫吓获取优势。这也导致英国开始将德国作为头号挑战者,^⑥引发大规模的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① 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231页。

② [德]赛巴斯提安·哈夫纳:《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回顾德意志国》,周全译,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75页。

③ [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④ 德意志帝国宪法第11条赋予德皇“宣战和缔约媾和”的全部权力。唯一能制约其权力的是联邦参议院(即德国上议院),该院主要由德国亲王和贵族组成,因此几乎不会违抗威廉二世的命令。

⑤ [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第116-118页。

⑥ John Maurer, “Arms control and the Anglo-German Naval Race Before World War I: Lessons for Toda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2, No.2, 1997, p.292.

如何理解德国外交决策突变的时机选择?关于权力转移的传统思维认为,鉴于英国霸权正在衰落,德国决策者应寻求等待时机,待权力转移取得进一步进展后再显露野心。^①那么为什么威廉二世会急于启动并抢先推行德国的“崛起扩张”战略?原因在于,威廉二世的时间视野在不断缩短,导致德国加快外交政策调整并最终选择了战略冒进。威廉二世想在短期内大有作为,为了取得与其实力相称的大国地位不惜直接冲向世界舞台。^②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威廉二世采用“世界政策”(Weltpolitik)来取代俾斯麦的“大陆政策”,主张迅速向海外扩张。威廉二世和身边的亲信都认为,世界已经快被瓜分完毕,德国如果不尽快扩张就可能失去大国资格。1896年1月,英国企图占领南非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但行动失败,此举遭到威廉二世的电报嘲讽,从而引发英国对德敌意,史称“克鲁格电报事件”(The Krüger Telegram)。^③在“世界政策”推行了十年之后,德国的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决策层感到安全环境严重恶化,更加强调时不我待。

一战前的德国决策者只看到自己的实力优势和短暂利益,却忽视了长远与全局危险。正如历史学家伊曼努埃尔·盖斯(Immanuel Geiss)所言,这一时期的德国外交政策的动机是“希望将帝国从大陆强国的地位提升到世界强国的地位”。^④在危机期间,德皇的外交决策显著偏好冒险。1905—1906年与1911年两次摩洛哥危机,被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重要节点,在这些危机中,德皇都展现出过于急躁的扩张意图,夸大诉诸武力取得成就的有效性。^⑤威廉二世听任危机升级的倾向,也反映了其易冲动的性格特征。当他看到德国驻英大使利希诺夫斯基的电报后,在上面写下怒气冲冲的多处批示:“是英国而非我们应对战争与和平承担全部责任!这必须让全世界都知道。”^⑥短期的时间视野激发了安全焦虑,当快速取胜受挫时,巨大的目标落差又会激发其孤注一掷的冒险。威廉二世时期的政治家们无疑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及其导致的帝国战略迷思。首次崛起的德国存在战略包围焦虑和战争准备冲动,决策者认

① See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J. C. G. Röhl, *Germany without Bismarck: The Crisis of Government in the Second Reich 1890–19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252.

③ 1896年1月3日,德皇威廉二世听到德兰士瓦共和国胜利的消息后,发贺电给南非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Krüger),电文不但嘲讽英国而且否认其对德兰士瓦的宗主权。

④ Immanuel Geiss,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German War Aim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1, No.3, 1966, p.80.

⑤ James W. Davis, *Threats and Promises: 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37–140.

⑥ Max Montgelas and Walther Schücking, eds., *Outbreak of the World War: German Docum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pp.321–322.

为与其坐等被卡脖子,不如主动先发制人。德国领导人相信,协约国已经包围了德国,战争不可避免,而且先发制人会取得优势,从而强化了时间紧迫感。^①

决策者预期未来战争不可避免或极有可能发生,就会加剧其对未来的恐惧,以及放大当前不作为的心理负担。在俄国威胁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德国领导人显然抱有赌博式热情,“趁成功前景和政治环境尚且有利时开始斗争”。^② 总参谋长毛奇指出,“俄罗斯在后备力量、铁路系统、火炮以及前线部队数量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同时动员时间比五年前缩短了一半。总体上施利芬计划仍然可行,但时间已不多了”。^③ 德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在国会发表讲话指出:“我们不想让任何人被贬低到阴影中,但我们也要求在阳光下占有一席之地。”^④ 其继任者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 1911 年对国会的演讲中继续宣称:“德国姗姗来迟,不幸的是,非常迟,才加入了殖民者的行列,如果我们趁此机会试图获得我们所能获得的一切,那么他们就不要责怪我们了……如有必要,[德国]将拔剑相向。”^⑤ 短期时间视野下的战略冒进信念,迅速在德国决策圈蔓延。

(二)短期视野下的扩张与战略包围

短期视野下的决策者缺乏耐心,某种程度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领导层更多受安全空间或风险前景的主观担忧的影响,而非实力对比与权力意志的驱使。^⑥ 换言之,作为当时德国最高决策者的德皇威廉二世急于打破“战略包围”,但在多个行为体互动的竞争领域中,局部危机会通过一系列竞争的连锁序列产生全局影响。巴尔干地区的事件序列本身就足够复杂,再叠加德国与英国、俄国和法国对彼此不确定意图的推测,危机可能性以非线性方式加剧,催生出相互刺激的安全困境螺旋。^⑦ 如果有一堆干柴随时准备燃烧,那么 1914 年萨拉热窝事件就是促使“燃烧”的火星。诸多

① See Klaus Hildebr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 B. T. Batsford, 1973.

② General Friedrich von Bernhardi,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Edward Arnold, 1914, p.20, 53.

③ David G. Herrmann, *The Arming of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69.

④ Mark Hewitson, “German Soldiers and the Horror of War: Fear of Death and the Joy of Killing in 1870 and 1914,” *History: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Vol.101, No.3, 2016, pp.396–424.

⑤ Mark Hewitson, *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loomsbury Academic, 2005, p.186.

⑥ Wolfgang J. Mommsen, “The Debate on German War Aim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1, No.3, 1966, pp.47–72.

⑦ Karen Rasler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trategic Rivalries and Complex Causality in 1914,” in Jack S. Levy and John A. Vasquez, eds.,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tructure, 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68–69.

行为者互动引发的一系列连锁事件,造成重叠竞争中的复杂战略后果。^①

当危机连锁反应时,德皇威廉二世预感到一场两线作战即将到来,决定先发制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部分研究认为这是一场无人愿意看到的战争;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许多大国相互纠缠,结成错综复杂的同盟,一系列的误判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诸多档案显示,这场战争基本上是由一心想称霸世界的年轻德皇发动。在陆地上,双方都陷入了堑壕战,在长达数年的战斗中,前线几乎寸步难行。但是,速胜作为一种信念,使得决策者在形势变得对德国不利时更愿意就此一搏。为了争取速胜,德国决策者认为,即使施利芬计划不能带来最理想的结果,至少也值得在尚存希望时一试。德国的军力扩张在一战前达到顶峰,而机会窗口即将关闭的预期促使其加快冒险,而激进冒险又引发事与愿违的结果。^② 在此背景下,德皇攫取“世界权力”的战略急躁无意中引发自己不想看到的战败结果。^③

德皇威廉二世的反复无常,也让内阁产生了争议。部分官员反对过快推进海军军备竞赛与“世界政策”,而是主张重回“大陆政策”和陆军建设轨道。一直到1914年大战来临之前,速战速决的心态与担心被包围的短期急躁主义情绪始终存在。1914年6月28日,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引发危机,德国领导层却将“七月危机”视为推进扩张路线的战略良机。面对巴尔干危机,德皇作出保证,无论奥地利采取何种强硬措施,德国都将全力支持。这使得奥匈帝国无异于拿到德国的“空头支票”,有了冒险的底牌。与此同时,德国越来越热衷于强制外交,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德国领导人得出结论,军事失败的风险比政治撤退带来的政治风险更可承受,先发制人以及迅速备战的优势毋庸置疑,而这意味着战争已经不可避免。^④

急躁主义与短期时间视野促使德国面临被整个欧洲包围的危险。1914年,以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主的“同盟国”开始挑战以英国、法国、俄国和日本为主的“协约国”阵营。因其加入的“同盟国”集团实力相对较弱,德皇认为,必须采取大胆的进攻战略才能赢得胜利。这一冒险赌博主要体现在“施利芬计划”中,即打算将德

^① Keir A. Lieber, "The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 and What It Mea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2, 2007, pp.155-191.

^② Jack Snyder, "Better Now Than Later: The Paradox of 1914 as Everyone's Favored Year for War," pp.71-94.

^③ Scott D. Sagan, "1914 Revisited: Allies, Offense, and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1, No.2, 1986, pp.151-175.

^④ Stephen Van Evera,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9, No.1, 1984, pp.71-75.

国军队集中在西部,以便经由比利时迂回包抄法国军队;击败法国后,德国军队可以重新集中在东部战线对抗俄罗斯。^① 德国的大胆计划反映出决策者的战略耐心与时间视野发生显著变化。^② 德皇主张以出其不意的速度取胜,然而早期攻势并未实现目标,战争演变为堑壕战和防御战,随着时间的流逝,德国决策者变得更加急躁。^③

面临战略困境,德国决策者更加认为事不宜迟,需尽快以强硬手段“打破包围”。时任德国首相比洛在演讲中公开指出:“一项旨在包围德国、在德国周围形成由大国组成的包围圈,以便孤立和瘫痪德国的政策对于欧洲和平将是灾难性的。形成这样的包围圈不可能不对德国产生压力,而压力必然引起反弹,这种施压和抗压的过程最终将产生爆炸性结果。”^④ 德国决策者的抉择如同“在黑暗中的一跳”(a leap in the dark)。1914 年 9 月,德国首相霍尔维格拟订“九月计划”,主张通过速战速决的方式争取战略时间,他说:“将军们都确信必须发动一场战争,否则就来不及了”。^⑤

在短期时间视野下,崛起国极速推进的扩张或边缘政策,会引发国际社会的恐惧。德国高级将领鲁登道夫深知,“尽管 1916 年战事取得了圆满的结局,但来年的前景却异常黯淡。”^⑥ 因此,他计划在西线继续采取守势,并多次警告即使是德国军队也无法无限期地承受“索姆河之战”式的消耗战。^⑦ 然而,1917 年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的决定表明德国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小。但德国决策层认为,“不受限制地使用潜艇是获得胜利和平的唯一手段。”^⑧ 如果没有残酷的潜艇战,德国将会输掉战争。最终结果是,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国战败,威廉二世仓皇逃往荷兰。1919 年 6 月 28 日,德国签署了《凡尔赛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四 1895 年委内瑞拉争端中美国的长期时间视野和有限扩张

权力转移研究文献主要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德竞争,往往忽视美国的崛起。1817 年至 1823 年,美国经济迅速发展,通过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其“丰

① See Robert T. Foley, ed., *Alfred von Schlieffen's Military Writings*, Frank Cass, 2003.

② Andreas Hillgruber, *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28-29.

③ Paul R. Sweet, “Leaders and Policies: Germany in the Winter of 1914-1915,”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Vol.16, No.3, 1956, p.231.

④ Imanuel 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Routledge, 1976, p.121.

⑤ “九月计划”的失败导致德国在西线陷入长期的消耗战,对德国的战争目标产生了负面影响。

⑥ Erich Ludendorff, *My War Memories, 1914-1918, Vol.1*, Hutchinson, 1919, p.305.

⑦ Ibid., p.307.

⑧ Hans W. Gatzke, *Germany's Drive to the West: A Study of Germany's Western War Aim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0, p.166.

丰富多彩的历史、巨大经济财富与为人类自由做出的贡献”奠定了基础。^① 到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美国人均 GDP 与英国大致相当,综合实力具有显著的领先优势。^② 此时,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强国,1913 年工业总产出占全球总量的 36%,超过英国和德国的总和。更重要的是,在工业效率方面,美国成为领先国家,1913 年,人均工业化水平比英国高出约 10%。^③ 一战前夕,美国和德国在国家实力的工业和生产基础方面都已成为英国强大的竞争对手。^④ 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美国采取了与德国不同的崛起策略,1895 年委内瑞拉边界危机则是理解英美在西半球进行和平权力转移的关键事件。

(一)“门罗主义”的长期视野与有限扩张

和平的权力转移需要基本的战略信任,但当战略信任不足时,崛起国就需要通过传递再保证信号化解不信任,或者主动展示良性意图。^⑤ 因此,相互再保证是互不信任的国家采取相互约束行动来使双方感到安心,最终建立合作关系的手段。^⑥ 约书亚·伊茨科维茨·希弗林森(Joshua R. Itzkowitz Shiffrin)认为,在国际体系中除了崛起国和霸权国,还存在诸多第三国,崛起国过早采取掠夺性策略会面临合法性危机。因此,明智的崛起策略是维持与衰落霸权国的合作,以提高战时获胜的概率与战后重建的合法性。^⑦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始终将战略重心集中于美洲地区,避免卷入欧洲纷争,既为本国回避与英国的冲突提供条件,也展示出美国从长时间视野出发支持而非削弱大英帝国的意愿,从而避免了类似一战前德国那样招致战略包围。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综合实力迅速增长,基于长时间视野以惊人的速度悄然崛起。1823 年,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门罗宣言”,即欧洲不干预西半球事务,美国也不参与欧洲事务。“门罗主义”叙事遵循“新世界”美国与“旧世界”

① Samuel F. Bemis,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lfred A. Knopf, 1956, p.300.

② Richard R. Nelson and Gavin Wrigh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The Postwar Er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0, No.4, 1992, pp.1931–1964.

③ Paul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11, No.2, 1982, p.294.

④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Random House, 1987, p.228.

⑤ 参见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林民旺、刘丰、尹继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五章。

⑥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5–9.

⑦ Joshua R. Itzkowitz Shiffrin, *Rising Titans, Falling Giants: How Great Powers Exploit Power Shift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5–30.

欧洲截然不同的原则,强调将欧洲国家对西半球的任何干涉都看作是“一种对美国不友好的体现”。^① 门罗主义反映了“西半球一体”的观念,认为美国的安全边界并不在北美大陆而是在整个西半球;因此,欧洲国家对西半球任何地区的干预都关涉美国利益。本质上,“天定命运”的例外论与美洲独立的“门罗主义”都致力于让美国远离欧洲的影响,从长远战略上将自身置于国际舞台的新领导者位置。^② 在 19 世纪中后期的崛起进程中,美国领导人大多秉持一种信念,即“美洲体系”与“欧洲体系”建立在不同原则之上,前者关注独立平等,后者奉行力量均衡。在卷入一战之前,美国试图将自己的“共和实验”与欧洲传统政治隔离,主要通过榜样吸引而非直接干预方式传播美国理念与制度。^③

尽管美国崛起过程也伴随着武力扩张,但是相对而言比较克制,没有引发本国与欧洲大国之间的重大冲突。美国决策者有足够耐心并愿意妥协,为本国崛起获得强有力的合法性支持。^④ 在那个充斥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美国不可能不参与大国竞争。而且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外交政策变得更为积极进取。1895 年,美国与英国就委内瑞拉边界争端产生争执,并于 1902 年至 1903 年在加勒比地区部署舰队。在门罗主义框架下,美国也因古巴问题与西班牙爆发激烈战争;美国要求对巴拿马运河拥有唯一控制权,主张重新划定阿拉斯加边界,展现出美洲事务不受他国干预的决心。^⑤ 但美国的扩张行动相对于其他崛起国而言较为克制,依然恪守孤立主义与门罗主义传统。^⑥ 美国参议院批准 1906 年《阿尔赫西拉斯协定》和 1907 年的《海牙公约》时特别附加一条说明,即国会遵循国父们确立的外交路线,保证“无意背离美国的传统外交政策”。^⑦

① [美]诺曼·里奇:《大国外交: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吴征宇、范菊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7 页。

② See Walter A. McDougall,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97, Chap.4; Anders Stephenson, *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 Hill and Wang, 1996.

③ 王立新:《帝国的叙事话语:国家身份塑造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89 页。

④ Barry R. Posen, *Restraint: A New Foundation for U.S. Grand Strateg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2-10.

⑤ “Monroe Doctrine, Dec.2, 1823,” in Henry S. Commager, ed., *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Vol.1)*,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8, pp.236-237.

⑥ John Ireland, “Extracts From a Speech at the Peace Jubilee, Chicago, October 18, 1898,” in Robert I. Fulton and Thomas C. Trueblood, eds., *Patriotic Eloquence: Relating to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and Its Issue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0, pp.170-171.

⑦ Manfred Jonas, “Isolationism,” in Alexander Deconde, Richard Dean Burns and Frederik Logevall, ed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tudies of The Principal Movements and Ideas, Vol.2*,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2, p.342.

在19世纪后期英国霸权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1895年爆发的委内瑞拉危机预示着美国向着崛起之路迈出关键一步。1811年7月刚独立的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存在边界争端。后因英国政府进行单方面边界划定、索取更多领土,谈判无果,委内瑞拉便开始向美国求助。19世纪末期,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逼近英国。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在介入拉美地区事务方面更加积极。1894年12月3日,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在提交国会的上一份年度咨文中指出:“英国和委内瑞拉之间关于英属圭亚那边界的争端仍然存在。我相信,在双方都同样尊重的公正基础上,尽早解决该问题符合我们既定的政策,即消除西半球与海外列强之间一切分歧根源。因此,我将再次努力促成争端双方恢复外交关系,并促成仲裁程序的提交。”^①

在决策者看来,发生在西半球的英国—委内瑞拉边界争端与美国大国利益有着重大关联。^② 1895年5月,强硬派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就任国务卿,美国开始强势介入英国与委内瑞拉的边界争端。为了利用国际舆论逼迫英国让步,美国政府直接要求国会拨款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将调查报告公之于众,以对英国在拉美的殖民活动施加道义压力。克利夫兰政府向英国表达了强硬态度,强调美国会“以任何方式”对拉美事务“承担责任”,暗示美国基于“门罗主义”做好了不惜与英国发生冲突的准备。^③ 此外,美国为了强化在拉美地区的政治领导力开始向英国提议进行国际仲裁,并基于国际舆论与调查报告向英国施压。^④ 最终,深陷欧洲地缘政治漩涡的英国决策者认为,美国门罗主义目标是有限的,其国际仲裁手段相对更加克制,因此缓和了与美国的争议,而美国的区域主导地位则随着委内瑞拉边界危机的和平解决开始确立。^⑤

美国通过有节制的扩张实践向世界表明,自由主义国际法原则会得到更严格的遵守。除了强调美国的外交政策并无任何“革命性”之外,门罗主义也强调对欧洲而言是公正合理的,美国不干预欧洲应该换取欧洲承认美国的地位。美国国务卿昆西·亚

^① “Mr. Gresham to Mr. Andrad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94, With 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ransmitted to Congress, December 8, 1894, Document 821,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894/d821>.

^② 韩召颖、袁伟华:《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国家意志制衡——以1895年英美解决委内瑞拉危机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第186-201页。

^③ R. A. Humphreys, “Presidential Address: Anglo-American Rivalries and the Venezuela Crisis of 1895,”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17, 1967, pp.131-164.

^④ Nelson M. Blake, “Background of Cleveland’s Venezuelan Polic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7, No.2, 1942, pp.259-277.

^⑤ Joseph Wheeler and Charles H. Grosvenor, “Our Duty in the Venezuelan Crisis,”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161, No.468, 1895, pp.628-633.

当斯^①指出:人类最宝贵的自然权利之一,就是在每一个政治联盟中,多数人有权自行决定采用它认为最有利于促进其幸福和繁荣的政府形式……如果美国为了追求革命目标而无视国际法,那么它就和拿破仑法国没什么两样,而拿破仑不是“自由主义者”。^② 概言之,威斯特伐利亚的不干涉原则指导了美国外交,这些不干涉和主权秩序准则证明维持美洲独立的合理性,不将任何欧洲国家视为命运主宰。^③ 尽管部分欧洲列强意识到,美国正在宣示其对西半球的统治地位。但门罗主义所依赖的国际法律和自由主义原则,从长期时间视野上淡化了美国的崛起威胁,避免英国将其作为优先遏制对象。

(二) 战略耐心与委内瑞拉边界危机的化解

为什么英国选择迁就美国的崛起? 主流理论解释认为,英国迁就美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战略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必要之举。因为美国远在重洋之外,英国无法调动军事力量或经济资源来遏制或对抗这个崛起的挑战者,而其近在咫尺的威胁远比遥远的大西洋威胁更紧迫。实际上在19世纪初,英国具备选择遏制或压制美国的空间,它试图利用印度和欧洲盟友来牵制美国。例如,英国在加拿大建立了强大的军队,随时可以站在西班牙一边,干预美国在西半球建立领导地位的行动。英美跨大西洋关系并非完全是友谊,而是充满各种猜忌、斗争。尤其在1812年英美战争后的几年内,“恐惧、猜疑和相互指责笼罩着英美关系”,几乎没有人相信两国即将实现永久和平。^④ 换言之,美国在第一次独立战争与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并没有让英国相信其善意,反而传递出在西半球进行革命与修正主义行动的信号。

崛起的大国往往面临一个重大困境,即如何展示自己的良性意图避免霸权国先发制人的打击。^⑤ 早在1817年门罗政府执政之初,美国意图在英国看来也是模糊不清的。但到了1817—1823年间,英国政界人士把美国视为一个目标有限的大国。推动

①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长子,1817年被詹姆斯·门罗总统任命为国务卿,其任内构思并发展了“门罗主义”的基本内容。昆西·亚当斯后来又担任了美国第六任总统(1825年3月4日—1829年3月4日)。为区别于其父,他又被称为“小亚当斯”。

② James Monroe, “Special Message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ntaining the View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Subject of Internal Improvements,”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May 4, 1822,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special-message-the-house-representatives-containing-the-views-the-president-the-united>.

③ Stacie E. Goddard, *When Right Makes Might: Rising Powers and World Ord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64–68.

④ Bradford Perkins, *Castlereagh and Adams: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12–182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p.156.

⑤ Stacie E. Goddard, *When Right Makes Might: Rising Powers and World Order*, pp.62–64.

这一转变的是门罗政府的克制战略,在急躁主义与耐心主义之间采取恰当策略,使英国相信自己的良性意图。尤其是,美国不断证明它一直在英国建立的“大西洋体系”规范下行事,不会彻底挑战英国在西半球构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①“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构成该体系的基础,各国必须承认并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准则,同时承认自由贸易应受到航运规则的保护。英国也希望在自由主义规范下消除奴隶贸易,认为美国的门罗主义主张与英国的大西洋秩序部分重叠但并不矛盾。为了说服英国妥协,门罗政府采取了多元策略,将美洲体系的法律诉求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以证明美国有限的扩张意图。

其实,在美国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美存在较为严重的冲突。以至于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甚至宣称美国“最终将不得不为此而战”。^②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英国严重依赖美洲原住民盟友来遏制美国的扩张,以更好地保护加拿大,并建立印第安缓冲国。^③如果美国奉行急躁主义路线,到处扩张并直接威胁英国的全球利益,那么这个崛起的北美大国也会遭遇霸权国先发制人的打击。关键在于,英国决策者相信美国与其他崛起国不同,它会尊重霸权国的核心利益,与其遏制美国不如进行引导与安抚。门罗政府的长期时间视野,使其保持了合理的战略节奏,如果操之过急则可能很快招致英国的遏制。因此,美国在扩张过程中基本上保持战略克制,其时间视野介于急躁主义与耐心主义之间,一边扩张一边证明自己的行动符合主权、不干涉和自由主义原则,基于此说服英国政府无需担心美国的战略意图。在委内瑞拉危机中,门罗总统删除和修改了国务卿亚当斯方案中过于激进的措辞,希望为英美关系留下余地,甚至致力于设想英美结盟。

美国对英国传递了大量安抚信号,缓解了霸权国忧虑。客观上,美国与欧洲大陆隔绝,不像德国那样积极地规划国防扩张。罗斯福总统在1905年对英国驻美外交官表示,在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时,美国从未考虑过与英国的战争。^④门罗主义要求美国对西半球各国承担保护义务,同时禁止与任何欧洲国家结盟。英美对各自势力范围的相互承认,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委内瑞拉争端可能造成的紧张局势。^⑤1898年

^① See Eliga H. Gould and Peter S. Onuf, eds., *Empire and Nati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e Atlantic Worl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Bradford Perkins, *Castlereagh and Adams: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12-1823*, pp.166-167.

^③ Kenneth Bourne, *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 1815-1908*,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67, p.59.

^④ Bradford Perkins, *The Great Rapprochement: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5-1914*, Scribner, 1968, p.45.

^⑤ W. Allan Wilbur, *The Monroe Doctrine*, D. C. Heath, 1965, p.84.

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后开始稳步的“后院扩张”,重点指向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岛屿。在崛起和扩张的初始阶段,除菲律宾外,美国的势力范围仅限于西半球。与此同时,衰落的英国在布尔战争之后,则专注于欧洲事务,减少对美洲地区的投入。

基于长期时间视野,美国与英国成功“协商”化解纷争,避免直接对抗。美国在委内瑞拉边界危机中保持了战略耐心与克制,英国退出美洲的举动也安抚了美国。美国所诉诸的国际仲裁,是基于 19 世纪英国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理念,主张以非战争方式将棘手的问题交由约定的仲裁机构解决,因此,这种方式很容易得到英国的认同。美国内战结束至委内瑞拉危机期间,两国至少将六项争端提交仲裁,包括阿拉巴马主权声索、圣胡安边界争端、内战主权声索、《华盛顿条约》中争议性的主权条款以及白令海远洋捕捞海豹的争端。^① 对此,英国决策者的看法是,“欧洲放弃”在拉丁美洲进行殖民统治的“原则”已成为“既定事实”,西半球无疑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朱利安·庞斯福特(Julian Pauncefote)表示:“美国似乎是我们现在唯一的朋友,与她争吵是不幸的。”^②

与德国崛起相反,美国崛起并没有引发世界大战。新兴大国对当前收益与未来收益的权衡体现出不同的时间视野,这对于理解其为何偏好某些策略至关重要。当崛起大国领导人具有短期视野,则会急于在国际体系中与霸权国展开战略竞争。这类领导人严重低估冲突风险,较少关注战略收益。而眼光长远的领导人更加关注未来可能出现的战略风险,战略上更为克制。20 世纪初,美国成为西半球最强大的国家。这一权力转移的不同寻常在于,尽管英国对美国未来的意图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转移最终未引发任何冲突。即便在英美关系紧张时,美国也是根据英国的自由主义不干预原则和国际法主权平等原则,以非战争方式进行博弈。面对英国初期对其长期意图的担忧,美国并未失去耐心,而是展示良性的长期意图。^③ 英国面对的新兴挑战者不止美国一个,但最终将最大威胁对象聚焦在急躁冒进的德国身上,反而给予相对克制的美国更多的崛起空间。

^① Yuen Foong Khong, “Negotiating ‘Order’ During Power Transitions,” in Charles A. Kupchan et al., *Power in Transition: 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45-47.

^② A. E. Campbell,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5-1903*, Longmans, 1960, p.124.

^③ Colin Elman, “Extending Offensive Realism: The Louisiana Purchase and America’s Rise to Regional Hegemon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8, No.4, 2004, pp.563-576.

结 语

将时间视野与战略耐心引入外交政策研究,有助于观察决策者的跨期选择、心理预期与决策,为理解大战略补充新的微观基础。^① 跨期选择的本质在于当下与未来的成本—收益权衡。具有长时间视野的行动者,不太可能受短期利益所驱使,而是更有战略耐心。相反,时间视野较短的行动者对眼前得失更加敏感与关注,更愿意规避损失,形成现状偏见。在不同的跨期选择的时间“视野”塑造下,德国与美国的崛起进程与最终结果大相径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决策者秉持急躁冒进战略,最终引发集体制衡。而崛起的美国克制扩张范围与竞争烈度,依托自由主义国际法使英国做出让步,并为崛起创造宽松环境。本文聚焦大国竞争中的时间变量,将跨期选择与时间视野纳入分析框架,为理解大国竞争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分析视角。

在理论创新意义上,揭示权力竞争中的跨期选择机制,有助于找回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忽视的时间维度。大国竞争的互动实践充满各种变数,时间压力对于每一方的感知而言都是不同的,若决策者认为“时间在自己这边”,就会倾向于采取拖延策略;而当决策者感到“时不我待”的紧迫压力,则更倾向于采取冒险进攻策略。在政策启示意义上,理解权力转移的复杂动态有助于制定更加理性审慎的外交政策,警惕跨期权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战略误判风险。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关系、美英关系进行案例比较分析,本文展示了大国崛起路径的不确定性与动态性,可为动态理解当今国际格局的深刻转型提供重要启示。

(作者简介:曹德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宋晓敏)

^① See Ronald R. Krebs, *Narrative and the Making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